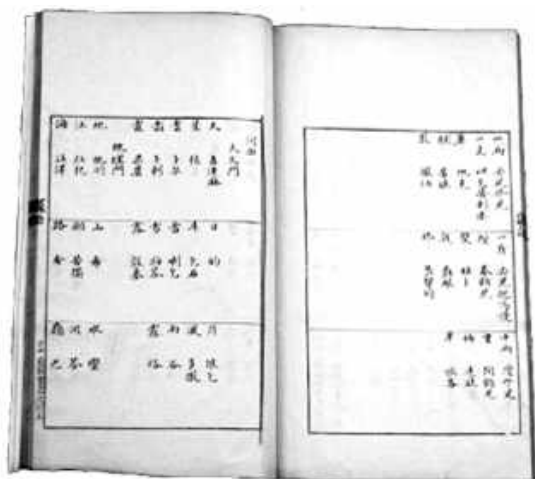


《河西译语》简介

聂鸿音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清代表袁寿皆贞节堂抄本《译语》1册，全书81叶，其中第64叶至68叶以“河西”为题，学界习惯上称这五叶为“河西译语”。《河西译语》于20年前始见报道（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年第2期），但至今无人确切知道书叶记录的是什么民族的什么语言，可以认定的只有一点，即这种未知的语言来自北元初年以宁夏为中心的西北地区。



《河西译语》

《译语》最后一叶题有“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书礼部造”，并有八思巴字“太尉之印”，这应该是清人从《译语》原本摹录下来的，而“宣光元年”也就是《译语》的初稿时间。“宣光”为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1338-1378）年号，其元年相当于1371年（一说1370），此前有学者说《译语》是明代作品，那是不对的。

和多数“华夷译语”类著作一样，《河西译语》也是由国家翻译机构编写的双语对照小词典，目的是供翻译人员在接待“外国”使节时参考。《河西译语》全书为“杂字体”，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身体”、“人物”、“人事”、“数目”、“珍宝”、“衣服”、“饮馔”、“颜色”、“方隅”、“通用”17门，共收词语255条，每条词语先列汉义，次列汉字对音，没有出现少数民族文字，据后一特征可以把它和明永乐年间四夷馆编写的“译语”区别开来。

按照学界一个世纪以来研究“华夷译语”类著作的经验，只要有现代少数民族语的帮助，人们就不难确定每种“译语”记录的是什么语言的什么方言，可是在面对《河西译语》时，人们竟找不到其后代语言的丝毫踪迹，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对其中少量词语的猜测。目前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汉文有以下3篇：

陈乃雄《〈河西译语〉中的阿尔泰语言成分》，载《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商务印书馆，1983）。本文刊布了《河西译语》全书，并指出其中有近70个词和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维吾尔语相近。

聂鸿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黄振华《清抄明代〈河西译语〉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1 年第 4 期。本文提出《河西译语》中有 30 个词和波斯语、阿拉伯语有关。

黄振华《清抄明代〈河西译语〉再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4 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本文提出《河西译语》中有 58 个词和西夏语以及其它藏缅族语言有关。

这三篇文章的讨论共涉及百余条词语，虽然其中是以成为定论的远没有那么多，但毕竟可以使人相信，当时河西地区使用的这种语言和藏缅、蒙古、波斯都有关系。当初蒙古军队攻占西夏时，这一地区遭到了严重的战争破坏，原有的西夏居民流离失所，直至 13 世纪 60 年代以后，蒙元统治者下令西夏流民归还本籍，又多次征调内地军民以及成吉思汗西征时掠回的阿拉伯、波斯、突厥穆斯林到河西屯田。这样，河西的居民除了原住的党项人、吐蕃人、汉人、回鹘人以外，又增加了蒙古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河西译语》的词汇来源复杂，正是那一地区民族成分复杂的必然反映。

不过从语言学上说，一种语言无论从其他语言中借入了多少词语，都不是以改变这种语言的本质特征，这就好比一个人无论从邻居那里学来多少生活习惯都不足以改变他的血统一样。现在的问题是，纯粹就血统而言，我们应该把《河西译语》定义为一种什么语言？也许可以结合历史事实设想这种语言的发展史。作为西夏故地的河西地区本来是通行番语（西夏语）的，这种语音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西夏灭亡之后，河西被忽必烈封给了他的三子忙哥刺，忙哥刺及其随行人员自然为这一地区带来了蒙古语调。不久，伊斯兰教进入河西，忙哥刺的继任者阿难答秦王成了虔诚的穆斯林，他甚至命令大部分蒙古军队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使得一批阿拉伯、波斯词语也通过经堂进入了当地的语言。《河西译语》的编成距西夏灭亡已经过了近一个半世纪，西夏原住民历经几代人与人数众多的外民族杂居，他们对祖先语言的记忆已经淡漠了，作为一种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语言，“河西语”呈现出与西夏时代大为不同的面貌，应该说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实上随着明王朝于永乐六年（1408）在宁夏首开科举考试，汉文学校遍布河西，番语很快就被汉语完全取代了。关于河西语言史的这个假设应该说是颇具合理性，但人们还没有找到语言本身的证据去科学地证明之，《河西译语》问题的最终解决离我们还是遥远的。